

杨茂公铜灯与墓葬年代修正

——兼谈宋金交替之际祖厉河流域文化面貌的转变

王科社 陈辅泰

(甘肃省文物局,甘肃 兰州 730030;
白银市博物馆,甘肃 白银 730900)

[摘要]杨茂公铜灯是1996年4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会宁县城北莲花山下清理发掘的一座砖室墓中出土,1997年10月由会宁县博物馆移交白银市群艺馆收藏的一件文物。本文根据新获铜灯铭文资料,重新推定杨茂公死于皇统五年(1145)正(戊寅)月初二(戊申)日,修正铜灯的制作年代为金皇统六年(1146)。同时,就铜灯铭文所记的杨茂公出生时间进行了分析,认为铭文中“丁巳相乙亥月丁卯日”(即熙宁十年十月丁卯日)是不正确的,可能为宋熙宁七(甲寅)年(1074)十(乙亥)月初三(丁卯)日或熙宁十(丁巳)年十一(壬子)月二十(丁卯)日。由此,可以进一步推知杨茂公墓构筑始于金皇统五年(1145),完工于皇统六年(1146),是陇右地区具有准确构筑年代的一座金代早期墓葬,对研究陇右宋金时期葬制葬俗的演变,尤其是探索北宋与金交替之际包括今会宁县在内的祖厉河流域文化面貌的变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杨茂公;铜灯;祖厉河流域;金代墓葬

[中图分类号]K87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20-0005-07

1997年10月,会宁县博物馆向白银市群艺馆移交了一批文物,其中有一件文物名为“宋代铜灯”。这件灯原是1996年4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会宁县城北莲花山下清理发掘的一座砖室墓中出土的。^①灯盘口径16.6厘米,足径14.1厘米,通高14.6厘米,上盘圆形,平唇浅腹,内底略弧,正中有插烛签,外底部有楷书“长命富贵”四字;喇叭形圈足中下部有楷书“杨茂公丁巳相乙亥月丁卯日生,寿命七十岁,乙丑年壬寅月□申日故,丙寅年己亥月庚申日”等37字铭文。白银市群艺馆根据发掘简报,将其年代定为宋代。关于此墓的年代,发掘者称“从铜灯的文字无法判断它的绝对年代,只能从墓葬形制和表现风格的差异,来判断它的相对年代”,便依据墓室内四壁上上部有仿歇山层顶的“山面”和彩绘8幅孝行故事图等特征,认为“和其他地区的同类型的墓相比,应定为宋代墓较为合适”。然而,发掘简报把铭文中“壬寅月”后的一字遗漏。笔者根据发掘简报中提供的铜灯图片资料,最初把这个被遗漏的字误认为“庚”字,由此将杨茂公的死亡日期误定为“庚申日”,而后采用排除法,分析铜灯的年代为金泰和六年(1206)。^②2010年底,笔者之一陈辅泰检对实物,确认铭文中“壬寅月”后一字为“戊”,肯定杨茂公死亡时间是“乙丑年壬寅月戊申日”。因此,有必要对杨茂公铜灯与墓葬的年代重新检讨,进行修正。

—

杨茂公铜灯的铭文以干支形式简单地记录了杨茂公的生卒年月日及埋葬的具体时间。杨茂公生于丁巳年乙亥月(十月)丁卯日,死于乙丑年壬寅月(正月)戊申日,葬于丙寅年己亥月(十月)庚申日。若按年头计算,从丁巳年到乙丑年刚够69年,但参考今天陇右民间计算年龄的习惯方式,可以称他享年70。他从死亡到埋葬约经历了22个月。由此,笔者认为制造与使用这件铜灯就被定格在某个特定的“丙寅年”。经再次推算,这个“丙寅年”是金皇统六年(1146)。

仔细推敲铜灯上与杨茂公有关的三个时间,埋葬的丙寅年己亥月庚申日是准确的,应依据了当年的历书,但是,生年十月与卒年正月的天干有一定的问题。按历法中“遁甲”规则,月的天干随年干而推,一年12月,5年就是60月,算一个甲子,所以甲、己年正月为丙寅,乙、庚年正月为戊寅,丙、辛年正月为庚寅,丁、壬年正月为壬寅,戊、癸年正月为甲寅。正月的天干一定,其余月份的干支可以顺次排列出来。有时存在闰月,而习惯上闰月与本月的干支是相同的。丁巳年的正月是壬寅月,十月的干支应是辛亥而非乙亥;乙丑年正月的干支应为戊寅,不是壬寅。这就是说,杨茂公应生于丁巳年辛亥月丁卯日,卒于乙丑年戊寅月戊申日。

考虑到杨茂公活了70岁的事实,不妨先把有关年

表 1 A、B、C、D、E 五组丙寅年十月日期干支

十月日期	天圣四年 (1026)	元祐元年 (1086)	皇统六年 (1146)	泰和六年 (1206)	至元三年 (1266)
初一	癸酉	乙酉	丁酉	戊申	庚申
初二	甲戌	丙戌	戊戌	己酉	辛酉
初三	乙亥	丁亥	己亥	庚戌	壬戌
初四	丙子	戊子	庚子	辛亥	癸亥
初五	丁丑	己丑	辛丑	壬子	甲子
初六	戊寅	庚寅	壬寅	癸丑	乙丑
初七	己卯	辛卯	癸卯	甲寅	丙寅
初八	庚辰	壬辰	甲辰	乙卯	丁卯
初九	辛巳	癸巳	乙巳	丙辰	戊辰
初十	壬午	甲午	丙午	丁巳	己巳
十一	癸未	乙未	丁未	戊午	庚午
十二	甲申	丙申	戊申	己未	辛未
十三	乙酉	丁酉	己酉	庚申	壬申
十四	丙戌	戊戌	庚戌	辛酉	癸酉
十五	丁亥	己亥	辛亥	壬戌	甲戌
十六	戊子	庚子	壬子	癸亥	乙亥
十七	己丑	辛丑	癸丑	甲子	丙子
十八	庚寅	壬寅	甲寅	乙丑	丁丑
十九	辛卯	癸卯	乙卯	丙寅	戊寅
二十	壬辰	甲辰	丙辰	丁卯	己卯
二十一	癸巳	乙巳	丁巳	戊辰	庚辰
二十二	甲午	丙午	戊午	己巳	辛巳
二十三	乙未	丁未	己未	庚午	壬午
二十四	丙申	戊申	庚申	辛未	癸未
二十五	丁酉	己酉	辛酉	壬申	甲申
二十六	戊戌	庚戌	壬戌	癸酉	乙酉
二十七	己亥	辛亥	癸亥	甲戌	丙戌
二十八	庚子	壬子	甲子	乙亥	丁亥
二十九	辛丑	癸丑	乙丑	丙子	戊子
三十	壬寅	甲寅	丙寅	丁丑	

代的范围放大,即从五代末到蒙元之初来考察。对照历史年表,杨茂公的生年丁巳年可能在后周世宗四年(957)、宋天禧元年(1017)、熙宁十年(1077)、金天会十五年(1137)、承安二年(1197)这五年中,卒年乙丑年可能在宋天圣三年(1025)、元丰八年(1085)、金皇统五年(1145)、泰和五年(1205)、蒙古至元二年(1265)这五年中,埋葬年丙寅年可能是宋天圣四年(1026)、元祐元年(1086)、金皇统六年(1146)、泰和六年(1206)、蒙古至元三年(1266)这五年中。综合起来,铜灯昭示有关杨茂公

的年代信息就有五种可能:

A.生于后周世宗四年,死于天圣三年,葬于天圣四年。

B.生于天禧元年,死于元丰八年,葬于元祐元年。

C.生于熙宁十年,死于皇统五年,葬于皇统六年。

D.生于天会十五年,死于泰和五年,葬于泰和六年。

E.生于承安二年,死于蒙古至元二年,葬于蒙古至元三年。

那么,在这五组信息中究竟哪一组是真实的呢?由于杨茂公埋葬的时间是准确的,我们就应先分析上列五组信息中的埋葬年的十月是否有庚申日,没有庚申日的就可以排除在外了。对于干支表示的日期,只要知道每月的朔日(即初一日)的干支就可以顺推。现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编排出五组中丙寅年十月的日期干支(见表1)。从这个表中可以出,宋天圣四年、元祐元年的十月中没有庚申日,而金皇统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泰和六年十月十三日及蒙古国忽必烈汗至元三年十月初一日的干支均为“庚申”。^③因此,我们就可以把A组和B组排除在外,集中分析C组、D组、E组。

按照同样的办法,我们可以把C组、D组、E组这三组中可能是杨茂公卒年即乙丑年的正月及生年即丁巳年十月的日期干支表排列出来(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到,金皇统五年(1205)正月初二日的干支为“戊申”,这就可以把D、E两组组排除了。就是说,只有C组的信息与杨茂公有关,即他死于皇统五年(1205),葬于皇统六年(1206)。

二

由杨茂公死于皇统五年(1205)、葬于皇统六年(1206)的结果,再看铜灯铭文中的出生时间,就发现这个时间不一定准确了。有三种情况需要分析:

(一)可能日干支不准确

熙宁十年(1077)十月中无丁卯(见表3),只有己卯、辛卯和癸卯。这就说明出生日的干支可能不准确,意味着杨茂公出生时间可能是熙宁十年(1077)十月的初二(己卯)日或十四(辛卯)日或二十六(癸卯)日。然而在这

表2 C、D、E 三组乙丑年正月日期干支

正月日期	皇统五年 (1145)	泰和五年 (1205)	至元二年 (1265)
初一	丁未	己未	辛未
初二	戊申	庚申	壬申
初三	己酉	辛酉	癸酉
初四	庚戌	壬戌	甲戌
初五	辛亥	癸亥	乙亥
初六	壬子	甲子	丙子
初七	癸丑	乙丑	丁丑
初八	甲寅	丙寅	戊寅
初九	乙卯	丁卯	己卯
初十	丙辰	戊辰	庚辰
十一	丁巳	己巳	辛巳
十二	戊午	庚午	壬午
十三	己未	辛未	癸未
十四	庚申	壬申	甲申
十五	辛酉	癸酉	乙酉
十六	壬戌	甲戌	丙戌
十七	癸亥	乙亥	丁亥
十八	甲子	丙子	戊子
十九	乙丑	丁丑	己丑
二十	丙寅	戊寅	庚寅
二十一	丁卯	己卯	辛卯
二十二	戊辰	庚辰	壬辰
二十三	己巳	辛巳	癸巳
二十四	庚午	壬午	甲午
二十五	辛未	癸未	乙未
二十六	壬申	甲申	丙申
二十七	癸酉	乙酉	丁酉
二十八	甲戌	丙戌	戊戌
二十九	乙亥	丁亥	己亥
三十	丙子	戊子	庚子

个结果中,只有年干支与铜灯铭文相合,到熙宁十年(1077)十月杨茂公的实际年龄为68岁,而月、日干支均不符。因而,这个时间的可信度只有37.5%。

(二)可能月干支不准确

如生年干支确为丁巳,顺推下去,熙宁十年(1077)十一月二十日是丁卯日。这就意味出生月的干支不准确,杨茂公出生时间可能是熙宁十年(1077)十一(壬子)月二十(丁卯)日。在这个结果中,除月干支与铜灯铭文不合外,年、日干支均相符,实际年龄为68岁,如果算年

头刚够“寿命七十岁”的条件。因此,这个时间的可信度为62.5%。

(三)可能年干支不准确

在前文已知丁巳年即熙宁十年(1077)十月的干支是辛亥而非乙亥,而熙宁七年(1074)十月的干支恰是乙亥,而且此月正好有个丁卯日。如果铜灯铭文中杨茂公出生月、日的干支即乙亥月丁卯日正确,则生年干支不准确,即意味着他不一定生于熙宁十年(1077)。从丁巳年到乙丑年即从熙宁十年(1077)十月至皇统五年(1145)正月按年头计算刚够69岁;从熙宁九(丙辰)年(1077)十月至皇统五年(1145)正月按年头刚够70岁,而实际为69岁;从熙宁八(乙卯)年(1075)十月至皇统五年十月实际年龄才是70岁,然而杨茂公是在皇统五年正月死亡的,如在熙宁七年(1074)十月到八年正月间出生仍然可以说是70岁。这就是说,铭文中所谓杨茂公“寿命七十岁”可能是大概说法。因此,我们不妨把杨茂公生年的范围稍微放大至熙宁年七年至元丰元年(1074~1078)来考察(见表3)。熙宁十年(1077)的可能性前面已分析过,在此只分析熙宁七年(12074)、八年(1075)、九年(1076)及元丰元年(1078)的可能性。

首先,熙宁八年(1075)十月的干支为丁亥,熙宁九(丙辰)年(1076)十月的干支为己亥,这两年的十月中也无丁卯日,并且年、月干支均与铜灯铭文不合,可信度低于25%。元丰元(戊午)年(1078)十月的干支为癸亥,是月二十六日为丁卯日;熙宁七(甲寅)年(1074)十月的干支为乙亥,是月初三为丁卯日。对于这两个结果再做进一步分析。

其次,假设杨茂公于元丰元年(1078)出生,到皇统五年(1145)死亡,实际年龄为67岁,明显不符合“寿命七十岁”的说法。并且这个时间中只有日干支相符,年、月干支均不合铭文所记。因而这个时间的可信度也只有25%。

再次,假设杨茂公于熙宁七年(1074)十(乙亥)月初三(丁卯)日出生,到皇统五年(1145)正(戊寅)月初二(戊申)日死亡,虽然按年头算为71岁,但实际年龄为70岁零两月,除年干支与与铜灯铭文不合外,月、日干支均相符,因此,这个时间的可信度达75%。

将上述五种结果综合比较,笔者认为杨茂公的准确出生时间可能是熙宁七(甲寅)年(1074)十(乙亥)月初三(丁卯)日或者是熙宁十(丁巳)年(1077)十一(壬子)月二十(丁卯)日。

三

根据发掘简报,出土这件铜灯的杨茂公墓是一座仿

表3 熙宁七年至元丰元年十月干支

日期	熙宁七年 (1074)	熙宁八年 (1075)	熙宁九年 (1076)	熙宁十年 (1077)	元丰元年 (1078)
初一	乙丑	己丑	甲申	戊寅	壬寅
初二	丙寅	庚寅	乙酉	己卯	癸卯
初三	丁卯	辛卯	丙戌	庚辰	甲辰
初四	戊辰	壬辰	丁亥	辛巳	乙巳
初五	己巳	癸巳	戊子	壬午	丙午
初六	庚午	甲午	己丑	癸未	丁未
初七	辛未	乙未	庚寅	甲申	戊申
初八	壬申	丙申	辛卯	乙酉	己酉
初九	癸酉	丁酉	壬辰	丙戌	庚戌
初十	甲戌	戊戌	癸巳	丁亥	辛亥
十一	乙亥	己亥	甲午	戊子	壬子
十二	丙子	庚子	乙未	己丑	癸丑
十三	丁丑	辛丑	丙申	庚寅	甲寅
十四	戊寅	壬寅	丁酉	辛卯	乙卯
十五	己卯	癸卯	戊戌	壬辰	丙辰
十六	庚辰	甲辰	己亥	癸巳	丁巳
十七	辛巳	乙巳	庚子	甲午	戊午
十八	壬午	丙午	辛丑	乙未	己未
十九	癸未	丁未	壬寅	丙申	庚申
二十	甲申	戊申	癸卯	丁酉	辛酉
二十一	乙酉	己酉	甲辰	戊戌	壬戌
二十二	丙戌	庚戌	乙巳	己亥	癸亥
二十三	丁亥	辛亥	丙午	庚子	甲子
二十四	戊子	壬子	丁未	辛丑	乙丑
二十五	己丑	癸丑	戊申	壬寅	丙寅
二十六	庚寅	甲寅	己酉	癸卯	丁卯
二十七	辛卯	乙卯	庚戌	甲辰	戊辰
二十八	壬辰	丙辰	辛亥	乙巳	己巳
二十九	癸巳	丁巳	壬子	丙午	庚午
三十	甲午	戊午		丁未	

木结构的砖室墓,墓内四壁的上部有仿歇山层顶的“山面”,“山面”间共彩绘8幅孝行故事图,有13个故事情节。从墓内出土的随葬物品数量和质量来看,杨茂公的身份是平民。分析此墓的相对年代,就从这几个方面看:一是“山面向前式”的建筑是在宋金时期开始兴起的;二是仿木结构砖室墓大约在北宋中期开始被平民所使用,到北宋末期成为北方最常见的墓葬形式,金代达到了顶峰,元代开始衰落了;^④三是使用雕砖和壁画并在壁面上用人物故事的形式表现成组孝行图的仿木结构砖室墓

是从北宋元丰年间开始的,尤其是孝行图在金代墓中最为流行,到元代以后才逐渐从墓葬装饰中退出。如若再参考金与南宋对峙时期会宁县境被金统治100多年的史实,该墓的相对年代定为北宋中期至金为宜。由铜灯的制作并专门使用于金皇统六年(1146)杨茂公葬事这一结果,可以确知杨茂公墓构筑也完成于金皇统六年(1146),说明此墓是陇右祖厉河流域具有准确构筑年代的一座金代早期墓葬。

陇右地区这种墓葬形式与风格应是从中原地区逐渐传入的,而在包括会宁县境在内的祖厉河流域出现应与北宋晚期会州地区的收复有必然联系。今会宁县境在唐代属会州,是陇右牧西使所领的监牧地。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沦陷于吐蕃后,始成为蕃人居地。于是,会州一带文化发生了蕃化,以畜物、著毡、辫发、蕃语等为标志的蕃文化逐渐融进当地人群的生活并且日益突出。经过220余年即到雍熙二年(985)李继迁焚毁会州城,咸平中(998~1003)宋弃守灵州,党项势力不断侵掠蕃族蕃地,“南至渭州安国镇北三十里,至南市界三百余里”,一时“族帐谋归贼者甚多”,^⑤会州蕃人陆续投属西夏,此地又成为西夏国土。自李元昊正式建国后,古会州的黄河以东地境基本属西夏西寿保泰监军司的防区。因此,在北宋收复之前,祖厉河流域尤其是今会宁县境的文化面貌呈现为蕃羌之风。熙宁八年(1075)七月,宋神宗曾批示说:“访闻通远军三岔堡地近累有西人叫呼,索逃背人口及失去牛羊。地分官多不与应报,或称并无,

致西人不绝辞说,久之恐生边事。可令经略司选官一员体量根究。如有盗牛羊投来者,尽送本界还之。”^⑥其中的“西人”指西夏人。说明当时两国边境尚在今陇西县的三岔堡附近,而今会宁县境明显属于西夏。元丰四年(1081)宋五路伐夏过程中,李宪率军收复西使(市)城、龛谷、兰州之后,“总兵东上平夏,入于高川石硖,进至屈吴山,营打罗城,与夏人遇,败之”,^⑦招降了以裕(禹)藏颖沁萨勒为首的蕃部,原本居住于西使城、龛谷一带的

禹藏郢成四及汪家等族率部(即禹藏花麻部^⑧)归附,其家属老小复归西使城、龛谷,交出了西夏颁给的“伪印并伪宣千数道”,^⑨会州南境的西使城一带被收复。之后宋在新收复地陆续修筑兰州城、定西城及质孤堡、胜如堡、龛谷堡、楚栋隆堡(元丰六年赐名通西寨)、榆木岔堡、熨斗坪堡等重要据点。^⑩但是,直至元祐六年(1091)六月,夏人数万进攻定西之东及通渭寨,攻毁边界崖巉;^⑪七月,两国方讲和划界,然而夏人仍力争通远军的定西城、熨斗坪、通西寨、榆木岔堡。^⑫元祐七年(1092)二月,游师雄称“今兰州距贼境一里,而通远军不及百里,又非有重山复岭为限障,夏人之势得以潜窥而轻突,边民不安其居者屡矣。宜自兰州定远城东抵通远军、定西城与通渭寨间建汝遮、纳迷、结珠龙(即珠结龙、聚卜结隆)三寨及置护耕七堡,所以固藩篱,此边防无穷之利也”,范育认为“如此则结珠龙川一带悉无寇患,然其地多在一抹取直之外……师雄之论乃边防之至计”,^⑬于是宋廷诏令诸路择形势进筑。从此情形来看,当时宋夏边境基本维持在熙河兰会路的质孤堡、定远城、汝遮寨、纳迷寨、结珠龙寨及护耕七堡、定西城、隆诺堡、秦凤路的通渭寨、达隆(龙)堡一线之北 10~20 里处,没有深入到会宁县南境。从绍圣四年(1097)到元符二年(1099),渭帅章楶举泾原、熙河、秦凤、环庆数路之力再次开边,陆续进筑平夏城、镇羌寨、九羊寨、没烟峡前后寨(即通峡、荡羌两寨)等据点,胜利击溃争夺平夏城的 10 多万夏军,熙帅钟传合熙河、秦凤两路四万精锐扫荡铍子山、吹鄂特川、白草原等处并搜空天都山西寿监军司,^⑭后来西夏统领会州一带蕃部的大首领嵬名药默降宋内属,^⑮泾原将折可适、郭成奇袭柔狼山巢穴俘获了西夏统军嵬名阿埋、西寿保泰监军妹勒都逋。^⑯伴随军事胜利,泾原路又逐步进筑秋苇川(临羌寨)、洒水平(天都寨)、南牟会(西安州治城),熙河路又逐步进筑青石峡(平西寨)、颠耳关(会宁关)、青南纳心(会州治城,在今靖远县城附近),将宋夏边界向北推进至打绳川、柔狼山、天都山一线,^⑰战略局面转变为“两路边面相接通,而秦州遂为腹里”,^⑱包括今会宁县境在内的祖厉河流域应是这次大规模开边过程中全面收复的。北宋在收复后的会宁境内设有会川新寨(即郭蛤蟆古城)、甘泉堡(今会宁县张城堡的西宁古城)等军事据点,隶属熙河兰会路的管辖。^⑲在军事推进过程中,宋招募了大量且耕且战的弓箭手来驻守新占领的寨堡,这些弓箭手便将中原尤其是陕西内地的风俗带入了熙河兰会路。从唐代沦陷吐蕃到北宋早期被西夏占领,再至北宋收复的这段历史看,包括今会宁县境在内的祖厉河流域的文化面貌是在北宋晚期由蕃羌风逐渐

转变为汉风的。因此,今会宁县境的仿歇山层顶的“山面”、彩绘孝行故事图的仿木构砖室墓的传入要比周边固原、西吉、静宁、通渭、定西等地要稍晚些,不会早于章楶开边之时。

四

杨茂公墓明显延续了北宋中晚期中国北方最常见的墓葬特征,是宋金交替之际当地再次形成汉文化主流的重要见证,对研究陇右宋金时期葬制葬俗的演变尤其是探索北宋与金交替之际包括今会宁县在内的祖厉河流域文化面貌的变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金天会八年即宋建炎四年(1130)永兴战役中,金军在耀州富平一带击败张浚统帅的五路宋军,而后乘胜大举西进,由张中孚、张中彦、李彦琪、赵彬等降将的引导,至次年三月即攻占了陕西五路大部地区。^⑳宋泾原经略使兼渭州知州刘锜在永兴战役后不得已由平凉退守瓦亭、德顺军,^㉑并步步南撤,金军乘胜很快占领了泾原路,并继续向西奔袭熙河。当时,追随完颜宗辅平定熙河的金主要将领是撒离喝,他率军“徇地自渭以西,降德顺军,又降泾原路镇戎军。进平熙河,降甘泉等三堡”,^㉒今会宁县境就是此时沦陷于金的。撒离喝在平熙河路过程中降下的这个甘泉堡,即今会宁县城东 25 里处的甘泉堡。^㉓占领德顺军、静边寨后,“金人以兵少,不敢由秦亭,声言分三道,而独出沿边以掠。熙素多马,金人驻兵,搜取无遗”。^㉔撒离喝率军由德顺军静边寨西进,首下之地必是今会宁县东的甘泉堡,而后再由此向西,分两道进军:一道至结珠龙堡(今定西市安定区西巩驿)至定西城;一道由会川城(元符二年建,位于今会宁县城西北郭城驿镇)至保川城,^㉕进而才能攻占熙河一路。后来,金在甘泉堡设置西宁县。杨茂公墓所在的今会宁县城一带,当时即属甘泉堡的辖区。贞祐四年(1216),迫于西夏进攻,金人又把会州治城迁至会州新寨,取名新会州,并将西宁县升为西宁州。以年龄而论,杨茂公的原籍很可能不在本地,因为出生之时这里尚未收复,也许正是绍圣之后 20 多岁的他被招募到本地或者在北宋晚期屯戍后留居于此,并且经历了北宋与金政权交替之际的社会大动荡。杨茂公的死亡发生在北宋绍圣元符开边收复会宁后 50 年、会宁沦陷于金 15 年之后,而且正值宋金和议达成之后两国关系正常邦交时期,^㉖他应算是金国之民。因为此时上距北宋灭亡时间并不太久,金人也没有在占领区强制推行女真族文化,相反继续推动中原汉文化在中国北方的发展。所以,在金人占领后的祖厉河流域,包括杨茂公墓在内的一大批金墓仍然继续着北宋晚期以来北方盛行的仿木结构砖室的形制。

孝悌观念一直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历代统治者也把提倡孝道孝行作为立身教民之本、安邦治国之基。宋金时期中国北方仿木结构砖室墓及其孝子故事为题材的墓葬装饰艺术对了解当时儒家孝义思想内容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赵超先生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掘的宋代墓葬中的孝子题材壁画和石棺线刻画的“创作时代大多在宋徽宗时期,表明在宋代晚期,中原地区,至少在河南与山西地区,孝子题材是墓葬壁画中十分常见的内容,而且这些壁画的构图与表现形式都十分相似”。^①魏文斌等先生对甘肃境内主要集中于陇中、陇南地区(兰州、永登、榆中、临夏、定西、会宁、陇西、通渭、天水、清水等地)10多座已清理发掘宋金墓葬中的30个孝行故事图进行过研究,发现这些孝行人物图“具有强烈的写实性,它们反映了当时流行的文人绘画状况和审美情趣”,“一方面反映了墓主人生活时代的精神文化面貌,另一方面表现了墓主人生前尽孝行道的生活以及希冀后代子孙行孝积善、以获福报的强烈愿望”。^②杨茂公墓中彩绘的8幅孝行故事图也是如此。发掘情况显示墓中出土随葬物品的数量并不多,质量也不太高,表明杨茂公的身份是平民或者说其家庭是崇尚儒道、讲求孝行的平民之家。作为平民之家,自死亡到埋葬长达22个月,在认识到当时会州一带经济状况确如范育所言是“地瘠人贫”^③的同时,还应看到,这样一座平民墓中坚持着来自中原的葬俗,尤其是“山面”间彩绘的孝行故事图,显示儒学“孝义”理念在本地已深入人心,显示出东来的汉文化在当地再度成为主流。

魏文斌等先生还注意到,陇中彩绘或砖雕孝行故事图的宋金墓与山西地区发现众多的“二十四孝”墓葬的情况相一致,这是一个值得探讨和研究的问题,认为“与北宋晚期社会动荡不安、金国南侵、北方大部分地方为金国所占领、南宋王朝偏居江南一隅的社会现实当有极大的关系”。^④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还应看到移民对其的影响。在北宋中晚期,有不少的山西人移居陇中一带,把具有山西特色的民风民俗带入陇右。无论是史籍记载还是民间口头传说,都表明当时有部分山西杨姓人移民到了陇中。据《宋史·杨文广传》记载,今通渭县与甘谷县相接处散渡河谷中的竿策城(大

甘谷口寨)是北宋熙宁元年由秦凤路总管杨文广主持修筑的,^⑤城址现属甘谷县大庄乡杨家城子村。至今此村民以杨姓为主,世代相传为杨家将之后。^⑥杨姓人移居此城后又以此为起点,继续向周边扩散发展,会宁及静宁、秦安、通渭、陇西、定西等地陆续出现不少“杨家将”后人。陇中各县存在不少与杨家将有关的文化遗迹,如安远镇至今仍有六郎山、六郎坟、三关口、西校场、校场坡、演武厅等地名,这些遗迹是山西杨姓在陇中活动的佐证。又据《宋史·苗授传》,苗授、苗履父子是潞州人,属唐代以来壶关巨姓苗氏后裔,苗授曾随王韶取镇洮,破香子城,拔河州,取珂诺城,“尽得河湟地”,先后知德顺军、河州、熙州,元丰年间“出古渭取定西,荡禹臧花麻诸族,降户五万”;苗履“束发从戎”,历熙、延、渭、秦四路钤辖,知镇戎军,熙河都监,元符初“以熙河兰会都钤辖知兰州”。^⑦苗氏父子在陇原征战过程中,也有可能带来不少故乡人为弓箭手。考虑到今会宁县境是绍圣元符开边过程中由秦凤和熙河两路军事力量联合收复的,收复后招募的弓箭手应当有由邻近地方移居的,很可能包括杨茂公在内的会宁杨姓中有一部分人也许就是移入的山西杨姓后裔。由此,对于陇右与山西地区的宋金墓特征相一致的问题就可以理解了。

五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其一,会宁县杨茂公墓出土铜灯的制作年代应为金皇统六年(1146),故应对以前所谓“金泰和六年”的错误进行修正。其二,有关杨茂公的准确年代信息应是:生于熙宁七(甲寅)年(1074)(乙亥)月初三(丁卯)日或熙宁十(丁巳)年(1077)十一(壬子)月二十(丁卯)日,死于皇统五(乙丑)年(1145)正(戊寅)月初二(戊申)日,葬于皇统六(丙寅)年(1146)十(己亥)月二十四(庚申)日。其三,杨茂公墓构筑始于金皇统五年(1145),完工于皇统六年(1146),是陇右地区具有准确构筑年代的一座金代早期墓葬,不仅对研究陇右宋金时期葬制葬俗的演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尤其是反映出在北宋与金交替之际,包括今会宁县在内的祖厉河流域文化面貌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已经由北宋收复之前的蕃羌风转化为与中原地区文化基本接近的汉风。

[注 释]

①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会宁宋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5期。
②王科社:《甘肃会宁出土的杨茂公铜灯年代考》,引自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西部考古》第4辑。

③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中华书局1999年重印本。
④秦大树:《宋元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143页。
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咸平四年十二月乙卯”条。
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6“熙宁八年七月壬申”条。
⑦《宋史·李宪传》。

- ⑧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2“元丰七年正月丁未”条载，陕西转运副使范纯粹入对延和殿，对神宗曾言：“通远军以北定西一带，元系夏国婿花麻所据之地也。通远军不满百里，自开拓熙河以来，更西大路与羌地咫尺，太牙相错，时有侵扼之害。昨因诸路出兵，羌族远遁，朝廷乘时遂举定西之役，故通远形势自此深密。”又卷365“元祐元年二月壬戌”条，司马光言：“其定西及兰州，议者或谓本花麻所居，赵元昊以女妻之，羁縻役属，非其本土。欲且存留以为后图，犹自有名御敌人者，不一而足。俟其再请，或留或与，徐议其宜亦无所伤。至于会州，尚在化外，而经略司遽称熙河兰会敌常疑中国更有辟境之心，不若改为熙河岷兰经略司。如此，则西人忽被德音，出于意外。”
- 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9“元丰四年十一月丁亥”条。
- ⑩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1“元丰五年十二月癸丑”；卷333“元丰六年二月丁未”条。
- ⑪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0“元祐六年六月丙午”条。
- 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2“元祐六年七月甲申”条。
- ⑬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0“元祐七年二月辛巳”条。
- ⑭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93“绍圣四年十二月辛丑”条。
- ⑮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0“元符元年（夏永安元年）四月”条。
- ⑯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4“元符元年十二月壬辰”条。
- ⑰宋张安泰撰《建设怀戎堡碑记》记：“崇宁元年壬午岁，承朝旨筑打绳川，熙河帅姚雄驻兵会川……西筑水泉、正川二堡，通古会。三月初，皆毕功，打绳川赐名怀戎，隶会州熙河第八将。后乙酉岁正月，割隶泾原，改第十五将。将官张普统人马筑通怀堡，接泾定、定戎，开护道壕。”（《重纂靖远县志》）碑记中提到的护道壕值得注意，笔者认为此道即沿今靖远县黄家洼山过苍龙山东古堡或苦水堡、芦沟堡、论古堡、永安堡、大庙堡等处至北城滩附近古渡口的唐代开辟大道，即丝路东段之陇右段，宋边壕应沿此路而开。又记，“怀戎东南曰屈吴山、大神山、小神山……西南白草原通会州。北有宝积山，产石炭、甘铁。东北去寿监军一百五十里，西北去马练城八十里”，“大观三年（1109）己丑春，废寨，主将兼领之。安泰于是年仲冬到官，布耳目，备战守。庚寅春，创瞻军园，补烽台，完城堞”。据《宋史·地理志》载，怀戎堡“北至柔狼山界堠四十里，系与西夏国西寿监军地对境。经由枯柴谷柔狼山有险隘去处”。大观三年秋宋与西夏分划地界，怀戎堡北属西夏西寿监军地，两国边界就在自黄河渡口、柔狼山至天都山一线。
- ⑱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0“元符二年五月癸卯”条。
- ⑲甘肃省会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会宁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 ⑳《金史》卷19《世纪补·宗辅纪》记载：“耀州、凤翔府皆来降。遂下泾、渭二州。败宋经略使刘倪军于瓦亭，原州降。撒离喝破

顺德军静边寨，宋泾原路统制张中孚、知镇戎军李彦琦以城降……帝进兵降甘泉等三堡，取保川城，破宋熙河路副总管军三万，获马千余，拔安西等二寨，熙州（今临洮）降。分遣左翼都统阿卢补、右翼都统宗弼招抚城邑之未下者，遂得巩、洮、河、乐、西宁、兰、廓、积石等州，定远、和政、甘峪、宁岭、宁洮、安陇等城寨，及镇堡蕃汉营部四十余，于是泾原、熙河两路皆平。”

- ㉑《金史·太宗本纪》：“天会八年十一月甲辰，宗辅下泾州。丁未，渭州降。败宋刘倪军于瓦亭。”其中刘倪应指刘锜。关于《金史》中极少见或避讳刘锜之名的问题，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的李浩楠先生曾重点对《金史》种种关于刘锜及顺昌之战的一些反常现象进行过考察，认为这是由于金世宗完颜雍早年参与此役并遭惨败，故讳言刘锜及顺昌之战，而其在位时期的金朝史官也极力隐讳，故意将刘锜的名字误为他人，混淆视听，以抹杀刘锜的存在（参考李浩楠《〈金史〉极力避讳顺昌之战——从“执宋所遣持书与刘四厢锜者七人”谈起》）。

㉒《金史·撒离喝传》。

㉓明·赵廷瑞等修《陕西通志》卷13记载：“古西宁三连城，宋靖康元年经略使章粦筑，名曰甘泉堡，后为元所灭。在今城东二十五里，故址尚存。”（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3页）其中所记筑堡时间有误，应是绍圣开边后修筑。或说是政和间章粦筑。

㉔宋·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2“天会九年二月”条。

㉕在今靖远县城附近。宋收复后仍置会州，倚州城设敷川县。金大定二十二年改敷川曰保川。因此，北宋会州城即敷川县治城、金保川城。

㉖《金史·熙宗纪》记载，皇统二年二月“辛卯，宋使曹勋来许岁币银、绢二十五万两、匹，画淮为界，世世子孙，永守誓言”。三月“丙辰，遣左宣徽使刘箬以袞冕圭册册宋康王为帝，归宋帝母韦氏及故妻邢氏、天水郡王并妻郑氏丧于江南”。四年至七年正月，都有“宋、高丽、夏遣使来贺”。

㉗赵超：《山西壶关南村宋代砖雕墓砖雕题材度析》，《文物》，1998年第5期。

㉘③魏文斌、唐晓军、师彦灵：《甘肃宋金墓“二十四孝”图与敦煌遗书〈孝子传〉》，《敦煌研究》，1998年第3期。

㉙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44“元祐五年六月辛酉”条，范育言：“臣访闻，定西一带川原广阔，昔喀木所居西市夏人置仓以积谷，智固、胜如川伪号御庄。自归本路，其土人皆走天都山及会州之境，地瘠人贫，未尝一日不回思其地。”

㉚《宋史·杨业传附文广传》。

㉛陈维山：《通渭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牛勃、马树平：《甘谷史话》之“杨文广大败西夏兵”，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

㉜《宋史》卷350《苗授传》。